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 $\frac{5}{8}$ 印张

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11098·9 定价：0.44

内部发行

目 录

导致新疆和平解放的历程陶峙岳 (1)

一九四九年新疆和平解放

亲历记刘锡宠 (11)

新疆九·二五和平起义

经过陈方伯 白文显 刘永祥 (31)

新疆起义前后的马呈祥王孟扬 (52)

酒泉起义经过概述.....彭铭鼎 (67)

回忆新疆和平起义.....李唐民 (77)

喀什地区和平解放的一些

回忆马平林 (88)

新疆和平起义前后的几点

见闻杜学增 (96)

新疆起义二三事陈希明 (107)

河西和平解放与确保玉门油矿

的回忆汤祖坛 (115)

新疆起义前的新疆日报程全楚 (121)

和平解放前后的乌鲁木齐 替玉林 (131)

回忆新绥公司 宫碧澄 (142)

随乌静彬去和靖宣慰经过 柴震森 (153)

清末王高升在迪化放火的

所见所闻 潘祖焕 (161)

参加盛世才的复审委员会

点滴回忆 宛凌云 (166)

关于乌斯满的点滴情况 韩有文 (169)

关于“艺文研究会” 李帆群 (173)

导致新疆和平解放的历程

陶 峙 岳

(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国民党驻在新疆的一支近十万人的部队，在新疆警备总司令部策划率领之下，宣布即日和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容，通电起义。随后，新疆省政府及其所属单位，在省主席包尔汉、秘书长刘孟纯、委员屈武等率领下，通电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新疆获得和平解放。

当时起义的部队，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序列的整编四十二师所辖一二八、六十五、骑八、骑九等四个整编旅，整编七十八师所辖一七六、一七八、一七九等三个整编旅，整编骑兵一师所辖一、二两个整编旅，包括驻在新疆的联勤总部系统的物质供应局和空军地勤人员。

起义部队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及有关方面申宥通电：“我驻新疆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文白将军之贤明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执行保卫国家、爱护人民之任务，兢业从事，始终如一。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新省远在边陲，各族人士无不殷切期望遵循张将军之一贯政治主张，确保地方之安定。而张将军复

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正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成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烈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九月二十八日给起义将士复电：“你们在九月二十五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设新新疆而奋斗。”

彭副总司令给起义将士复电：“将军等率领部队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民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

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斗争，起义终于实现了。当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在报纸公布之后，全疆各族人民真是无比兴奋。

(二)

新疆起义由渐变到突变，经过了曲折崎岖的历程的。追溯源流，有它的前因后果。

早在一九四三年，盛世才在新疆政治投机失败，国民党的势力伸入新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压迫剥削，于一九四四年激起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民族人民武装革命，一九四五年九月进逼玛纳斯河对岸，形势十分紧张。当时张治中将军奉派飞新，通过与有关方面联系，认为新疆问题只有遵循和平途径来解决。经过重重的努力，通过曲折的和谈，于一九四六年春夏间与伊、塔、阿三区代表签订了和平解决条款。接着成立了有各族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和增进中苏亲善的外交政策。同时，成立了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我曾一度调来主持其事，不久即由宋希濂接任。由于以上各项措施，对内消弭了战争，对外得到了苏联帮助，在相当时期内出现了相对的安定局面。这就对新疆后来的和平解放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九四七年夏，由于一系列事件导致了民主联合政府的分裂，伊、塔、阿三区人士撤回伊犁。新疆局面一时陷于僵持状态。张将军深深感到：如此下去，新疆仍有流血危险，认为有调整新疆军政负责人而首先是军事负责人的必要。因此，我于一九四八年秋以西北军政副长官再次兼任了新疆警备总司令。当我将去新就职时，张在兰州私邸，出示他迭次建议蒋介石力主国内和平的一些函件和谈话记录，并谈到一些

今后的安排，因而对于新疆将来出路问题，已是“心照不宣”，有了共同的默契。

到一九四八年底，东北国民党反动派部队全部被歼，天津相继解放，北平正在酝酿和平，国内形势迅速发展。在张将军考虑新疆问题中，已认为必须进一步在亲苏原则下，保持和平局面，巩固民主团结，设法恢复和伊、塔、阿三区的合作，准备过渡到“和平交代”。就在一九四八年底按照预定计划改组了新疆省政府，把大土耳其主义者——新疆省政府主席麦斯武德撤换，以包尔汉任主席，借谋三区关系的改善与新疆和平局面的确保。

新疆的政治关系正在调整，军事的压力乃相继袭来。关内的顽固派垂涎新疆的几万军队，企图把它拿去当炮灰。

一九四九年二月，曾接李宗仁电报，新疆驻军除留一旅担任防务外，余悉调进关，参加内战。马步芳则要把骑一师调回青海，宋希濂也要把军官训练班全部及其武器装备调进关内。这些部队派系复杂，究竟听调不听调，非我一己之见所能决定。为了统一认识，就以整编部队名义，召集师旅长会议。结果是意见分歧，极不一致，未作具体决定，且看形势发展，由我最后作出安排。于是采取了拖延办法，感于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开拔计划报得大，行动经费要得多，就以此作为应付手段。自己则多方借口，坚持不去南京、广州。拒绝部队调动，确是新疆局面而后发展的关键所在。一拖再拖，时间就是出路。但这也是在新疆特殊情势下，方能出此一着。

通过以上一系列安排，新疆局势可以拖下去，但最后如何动员部队起义，则有待时机的成熟了。

(三)

西安解放，西北局面改观，时机就一天天迫切起来了。约在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对于起义开始酝酿。首先是刘孟纯（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省府秘书长）、陶晋初（总司令部参谋长）、屈武（省府委员兼迪化——现改乌鲁木齐市长）、刘泽荣（驻新外交特派员）、梁客浔（总部政工处长）等各向有关方面联系、交谈、分析和反映。当时机未到绝对成熟，防止万一有失，我不能公开表示什么态度和流露任何感情。但认为总司令部领导人的意见必须一致，南北疆部队的行动必须一致，为此，我在八月十五左右，偕物资供应局长郝家骏、政工处长梁客浔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约了驻在南疆喀什的副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在焉耆见面。那次密谈是没有第三者参加的。赵本极不愿意部队内调，对于起义部署，深表赞同，南疆就由他负责。东疆毗连甘肃，酒泉是其门户，而河西走廊正是兰州的退路。赖有彭铭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曾震五（八补给区司令）两人在兰州暗通声气，不仅曾与新疆互相呼应，而且促使酒泉和平解放，确保玉门油矿安全，彭、曾尽到最大努力。

当马步芳接任西北军政长官，驻在新疆部队之最听指使者为其嫡系整编骑一师师长马呈祥。其他如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所属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虽为胡宗南系，而罗与马私人亲善，勾结甚密，叶则俯仰其间。他们有一共同意识，则为反共。当兰州战事日益紧迫之际，驻新部队内调问

题又形紧张。以马呈祥为中心，罗恕人实为主谋，每以内调为请，实则不愿率部起义，态度极为明显。考虑到部队将领情况如此复杂，如处置未当，一旦决裂，后果何堪设想。于是就以内调为题，经与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从事恳谈。首先从新疆本身特点，根据当时全国形势，新疆怎么办谈起，天天谈，夜夜谈，谈的方面很多，无非是希望他们放弃内调打算，从而不致阻挠准备起义的各项安排，到必要时，可设法满足其个人行动的物质愿望。对这些人说，要他们一旦在政治上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是不容易的，只有从许多利害方面逐渐说服他们。

兰州情况益紧，解放就在目前。时机已临到最后阶段，我不能不表示态度和决心，只有打开窗户说亮话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应干涉他人自由。但必须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有人不赞同起义，也就是不需要和平，那么，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争。谈到战争，必须在作战上能操胜算，后勤上有把握，才能应战。我们新疆的军队虽号称十万，但只能应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援。何况从军事上看，兰州、西宁相继不守，外援断绝，退路不通，运输困难。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能不能作战呢？再从基本上说，新疆的问题，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由于民族的关系，决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基本政策上，一切都需要运用和平方式，也就是要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的。否则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们自己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果我们不争取主动，求得和平解放，将使十万官兵，盲目牺牲，地方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引起民族仇杀，都是必然的结果。如果坚持战争，放弃和平，一定会弄得既不能战，又

不能谈和的地步，进退两难。又何苦乃尔呢？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请大家选择吧！”这一席话，叶、马、罗等亦未表示反对。更从罗恕人淌下眼泪来看，似乎有动于衷。但他们的思想感情，还是处于摇摆、混乱、矛盾的状态。

事态的发展，总是有起伏的。就在经过多次恳谈之后，一日深夜，我已就寝，叶成急来扣门。说：“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除君侧’，决定今晚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我提议应先告诉你，他们同意，故来相告。他们限我半个钟头以内回去。”我想叶之来告，其中还有几分感情作用。因留叶，电话约罗与马来谈，语极恳切，他们果即来。相见就一言直入：“你们要捕人，第二步怎样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样，于你们有甚么便宜？”当时，他们相顾无言，只见罗恕人淌下泪来。久之，嗫嗫而言：“我们内心有痛苦，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屈……”听罗之言，可以想见他们的矛盾苦恼，大都是基因于为个人打算，应即因势而利导之。我说：“大家知道，一个人基于个人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与是非，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让我以冷静头脑为你们考虑问题，因应恰当，何用遇到困难而只是长吁短叹，甚至与你们相对而泣呢？目前整个局势，你们知道很清楚。应不再设想象部队内调那样无济于事的烦恼问题了。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也好，望再细想之。我要把一颗赤裸裸的心摆在你们面前，我决不离开新疆，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样责任，尽到责任，虽死不辞。”话头很长，尽

情倾吐，因而他们也就平静下来。一场风波，总算平安过去。东方快发白了，始各散去。在此险恶关头，脸皮幸未撕破，留有余地，大事就好办了。

第二天，我单身匹马地闯进老满城骑一师师部，他们正在开会，见我突然而来，神情颇为不安。但看不到一个随从，表示对他们是相信的，他们也就释然。我乘机作了进一步解说，比昨晚说得更深些。他们甚至连推想到我日后会如何行动都说出来了。不过他们对我心事的估计错误，纯系从个人着想出发的。立场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无足为怪。经过这次长谈，似很投机，他们最后露出笑容，对我意见似以首肯。后来，通过各方面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接触解决，尽可能满足其物质愿望，复由刘汉东（迪化警察局长，和罗恕人等结交深）加以劝说，事机已见好转。最紧要者，在解放军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下，西宁继兰州之后急速获得解放，马家巢穴，破灭无遗，马呈祥已无留恋余地。且得到消息，他在青海家属已安全逃到广州。另方面，马步芳最后逃往香港时，还携走骑一师应得军饷银元五万元（例由青海拨付），也使马呈祥极为不满，认为临难不相顾，情谊何在？在此内外影响之下，于是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明白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续，许其循南疆去印度。满天烟雾，至此稍露曙光，就是大局从此可以暂告稳定，容许另作安排。但事后也有人提出指责，谓不应让反革命逃走的。不错，从某种意义来说，应有此议。但是事实也应顾到反革命是不会甘心自己灭亡的，总想来作最后挣扎。蒋介石、胡宗南知道新疆情形，一面来电骂我“投降共匪”，一面暗中分别勾结部队将领，以遂私图。蒋胡之流，惯耍这样流氓手段，对驻新部

队经费从六月份起分文不发，而以开拔费名义汇来百万元（通过兰州长官公署，马步芳又扣去二十万元，所余恰够维持生活三个月），其险毒无耻，令人愤恨。直到叶成、罗恕人、马呈祥整装待发之前夕（九月二十三日），胡宗南还有电分致叶、罗、马三人，要他们把队伍带到南疆，许以空投接济。他们最后集议，卒以“大势已去，不能有为”而未反前议，这是叶成当面告诉我的。依据以上事实来看部队动向，是极为微妙的，要罗恕人等赞同起义，势不可能。如果坚持不让他们循着适当的途径离开，一旦横生枝节，事情也很不好办。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偕其家属于九月二十四日离迪南行，新疆部队的起义通电就在二十五日发出了。以后他们经过阿克苏时，还有人逼令叶成回迪，幸未酿成变故，新疆终于获得和平解放了。

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大会正在北京集会，新中国即将诞生，对于新疆能否导致和平，当为各方面——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所殷切关注。张治中将军奉毛主席指示于九月十日由北京来电，晓以大义，嘱即行动，并对今后部队安排作了详细指示，其关切之情，尤为备至。我们于十六日收到此电，感奋之余，更难忘起着促进作用。一年以来，在新疆局势动荡中，对有关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策动、筹谋、统一，刘孟纯、陶晋初、屈武、刘泽荣以及其他许多同志突破万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新秩序亟待建立。经此一大改变，

除极个别地区小有骚动，总的来说，全疆是安定正常的。我们只想今后如何巩固地方秩序的安定，进行部队的彻底改造，能为建设新新疆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没有要求，一切听党的话。首先是希望正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能够提早进到新疆。为此，我偕郝家骏于十月六日到达酒泉，曾震五、彭铭鼎已先在此。我们会见了彭副总司令和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政委王恩茂将军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将领。对于起义部队和地方现实状况作了详尽的汇报，也接受了亲切的指示。在王震将军亲自主持下，商定了起义部队的改编方案。这一改编方案，是依据现有人员武器实际数目，按照解放军统一编制订下来的，一切应有待遇，与解放军毫无差异。到一九四九年底，在上级的领导和解放军兄弟部队的帮助下改编完毕，从此归入到人民军队行列，废除了旧制度，建立了新制度，就这样开始新生了。有关解放军由酒泉向西进军的运输问题，也依照王震将军的规划安排，由原驻新后勤机关就现有车辆、汽油、器材等尽可能提出部分供应，有便于解放军输送，赶快驰往全疆各地，这对后来新疆局势的发展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解放军先头部队战车第五团于十月间到达新疆首府，其余部队也随后分别进抵天山南北和昆仑山麓。各族人民见到自己的军队，欢迎之热烈，真是盛况空前，载歌载舞，夹道欢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之声响彻云霄，亦可见其期待之殷切。由于解放军的迅速到达，革命秩序建立起来了，于是新社会的建设也就从此开始了。

（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

一九四九年新疆和平解放亲历记

刘锡宠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新疆和平解放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思想和胜利，是敬爱的周总理正确运用统战政策的硕果，是广大人民的愿望。

国民党驻新疆部队的“九·二五”起义，是经过中国共产党较长时期的策动工作，解放军迅速进军所造成的有利条件，各族广大人民的配合和国民党中的“起义派”，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才取得胜利的。这段历史的前后情况，仅将我个人所直接接触的事实，经过回忆写下来，略补空白。但事隔三十年，所写出来的东西可能挂一漏万，望了解情况的同志，加以补正。

一、党对新疆和平解放的策动和影响

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内部情况，曾作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并作了多次精辟的分析。早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就指出：“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份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它的大多数党员（很多是挂名党员），并不一定是顽固派。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它们

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一九四五年在《论联合政府》中，又有类似的分析。根据这一论断，结合过去一些国民党将领的起义和北平解放的具体实践，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党对新疆的解放，就是根据这个指导思想进行工作，取得胜利的。

党对新疆策动工作，是新疆和平解放的根本，这是必须首先认识清楚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张治中给驻新国民党部队的领导人陶峙岳、赵锡光的劝说起义电报，是促进他们决心走起义道路的关键。电报是周总理指示发的。

张治中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是蒋介石的同学和亲信。一九二四年周总理在广东黄埔军官学校任政治部主任时，他是该校的“副官长”，对总理是很钦佩的，思想上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以后国共和谈中，张治中多次是国民党的代表团团长，因为看到了不能抹杀的真理，思想上受到一定的影响。他曾在延安说：“不要忘记我五次到延安来。”（我是听他的随从说的）一九四七年他回安徽省巢县探家，路经河南东部，看到被战争破坏的农村情况，曾说：“内战！内战！再打仗老百姓就不要活了……”他在国民党中，算是“进步派”，也有人称他是“民主将军”，属于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一九四六年春，他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行辕”主任，兼伪新疆省政府主席，后改称西北军政长官。在最后一次举行国共和谈时，他率国民党代表团到北平去，经周总理做了说服工作，留在北平了。一九四九年五月，他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发电报劝说陶峙岳、赵锡光、刘孟纯在新疆

起义，使犹豫中的陶峙岳下了决心，选择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伪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是陶峙岳的堂弟，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于一九四八年秋来新疆任职。他于抗战时期，在重庆和乔冠华相识，周总理指示在重庆工作的乔做陶的策反工作。陶晋初来新疆时，乔劝说他在新疆相机行事，做起义活动（这情况是陶晋初在四九年春天告诉我的，来新前他好象是在香港和乔见面的，我记不清楚了。）周总理利用陶和乔这个关系，对新疆做策反工作。

一九三八年党中央派陈潭秋和毛泽民等同志来新疆工作，播下了革命种子，如：起义前新疆的战斗社等几个反国民党组织，是受那时共产党人在新工作的影响的。所以新疆的和平解放不是某一个人的、偶然的、一时的、一种因素决定的，而是党经过长期的、复杂的、细致的工作得到的结果。

二、起义前的新疆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匪帮集中力量抢夺东北及内地各省的胜利果实。甘肃以西各省，则派张治中来维持他的统治局面。张不是军事上的实力派，西北情况又复杂，他想利用政治作为统治西北的主要手段。一九四六年春他来新疆时，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形成与民族军隔玛纳斯河对峙的局面。他采取改良主义的政策，治理新疆，首先是和民族军举行和平谈判。九月初谈判成功，组成有民族军代表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赛福鼎等参加的新疆